

评论

后共产主义城市： 一个不可比较的社会地理学实验室

加里亚·比热尔
居伊·比热尔 著
乔 亚 译

对于东欧和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城市的研究,不仅仅为社会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提供了近缘的异国情调的诱惑。它们也是观察联结城市物质性(有建筑物的空间的扩展,不同的建筑形式,基础结构与服务设施的分布类型)与社会结构(管理方式、经济举措、社会交往表达)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卓越观察所。在俄罗斯是 3/4 个世纪,而在东欧国家则是 50 年间,具有许多个世纪悠久历史的一些城市两度改变体制:从自由工业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从干预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市场。这些城市仿佛为了揭穿诗人(波特莱尔)的呓语,其改变的速率并不比人的心脏跳动更快,而是按照它们的连续性,按照它们的呼吸和梦想的节奏搏动着。

更加确切地说,后共产主义城市突然提出了整个社会演化的中心问题: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在断裂时刻如何构想现代性并将其贯彻于建设空间的物质生产之中。也就是说,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而定居在人口密集地域的居民,匆忙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开放世界,这个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而

并未减弱那种进退维谷境地的压力：应该抛弃过去，建设一个具有新进程面貌的新城市，抑或以实用的方式去适应它并进行重新释义。城市文明总是在诸如此类的激进道路面前犹豫不决，通常采取中庸立场，却又或多或少受到某些比较极端的方案吸引。

城市的形态和城市化的扩展，显而易见成为这样的选择的最为具体的见证。除了若干引人注目的例外（为了张扬波兰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完全按照老城重建华沙，拯救沙俄旧都圣彼得堡的中心区，或者布拉格市中心博物馆的改造等），共产主义制度大规模地选择了抛弃从资本主义遗传下来的旧城（布达佩斯）或者进行开膛破肚外科手术（莫斯科）的做法。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乃是在郊区建设大批的集体住宅，我们称之为大楼群。这样的楼群建得匆忙，用的是工业预制材料，遵循的是苏联的所谓“小区”的千篇一律的功能主义原则（几千座高楼或者甚至是几万座公寓包围着基本生活设施——小学、医疗所等，附近散落着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极低微的若干商业服务点）。从柏林到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从索非亚到鞑靼地方的卡马河畔切尔内市——且不说阿尔及尔的郊区！——都可以见到通过不计其数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技术援助传播的这种城市规划设计和“老大哥”的影响。意识形态的理由与技术的理由相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模式得到迅速传播。最为有力的理由则显而易见是抛弃一切“无政府的”密集城市形式，因为那是既受到刻板的意识形态专家谴责又受到接近现代运动的开明建筑师们批判的资产阶级蜕化和社会压迫的象征；刻板的意识形态专家视之为反革命反动活动和无产阶级异化的基地，而开明的建筑师们则怀抱着建设所谓理想之城的希望。郊区住宅区蔚为壮观地出现，前者和后者都实现了他们的幻想：一个没有等级和单色调的城市，就连住房分配的准则也完全划一，乃是代表其所孕育的新人形象的合理生境。由此甚至彻底颠倒了城市空间分配的旧逻辑：在莫斯科，城外居民区——曾是我们的郊区——住房密度比市中心区高得多！

那么市场经济和房地产业的自由化如何改变了上述情况呢？何止如此，创新的意图与抛弃苏联时期模式立竿见影。从布达佩斯到莫斯科，建设一个“新城”或者至少是一个商业区，以接纳跨国公司和合资公司的构想，萌发了种种规划：在匈牙利首都下游 6 公里的多瑙河一个岛上建设一个卫星

城的规划依然停留在一纸蓝图上，而“莫斯科城”——当然是处于居民区中心的莫斯科“拱卫城”——在一个广阔的城区废弃地带以缓慢的速度开工建设。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周围的个人生境的迷恋与日俱增，表现出被几十年的集体制约过分长时期地遏止的社会群体的狂热。在莫斯科，“科塔基”即庄园别墅在森林公园的绿色环形地带扩散，也在通过这些有着雉堞装饰的住宅把旧俄罗斯与“新俄罗斯人”的成功结合起来的人们心灵里扩散。而在布拉格就像在布达佩斯和华沙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统计证明，城市郊区化正在前进。

但不应该夸大诸如此类的趋势倒转。特别是较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的观察当然会夸大新现象，而可靠的和局部的统计中经常存在的缺漏有利于造成新现象多于常量的印象。只要了解集体住宅区的重要性、住宅危机所延续下来的物质短缺和各种新角色（企业办公室、居民服务机构）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显而易见，居民们不可能大规模地迁出共产主义时期的建筑，尽管这些建筑的维修常常是可悲的，而且出现象征性的拒绝入住事件。同样，对于外国或者本国公司来说，收买老建筑——经过更新或者简单修复——往往提供了即使不是比较有效也是比较便捷地开业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拥有比无名的现代大厦更为可靠的地址而赢得声誉。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式的大楼，一旦粉刷一新和恢复正常，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建筑和厚利地盘，而布达佩斯的一些奥斯曼式建筑（安德拉西大道）也是如此。反对这种对于建筑的重新使用，所引发的当地原来的居民——至少是不能直接从出售或出租他们的住房中得到好处的居民——的反对要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主角们更多。于是，市政当局必须在城市的主要利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基层的民主要求——即使是在市中心空间中也能够行使——之间做出取舍。可见，城市地域的变革并非是社会变动的即时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或多或少间接的中介来确立的。

由于在如何保持文化面貌方面依然歧见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大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偶然的来访者也不能不对苏联城市供应的贫乏与中国的传统市场在红色中国所保持的富裕——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进行对比，尽管红色中国要比没落的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强硬得多。毫无疑问，这显示出一种古老的重商文化

遗产与对交易保守和冷漠得多的乡村文明之间的不同。除了苏联城市的宽松氛围和摆脱封闭愿望的普遍倾向之外,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俄罗斯的城市中今天有两种趋势以更加持久的方式对峙着:一方面是真正的市民阶层所表现出的对于乡村生活的深刻依恋,另一方面则是更加富有特色的某些城市趣味。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期间,所谓的“达恰”——从贵族和后来契诃夫《樱桃园》中的资产阶级的领地,演变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坚固房舍,直至赫鲁晓夫式的分割成小块的花园中的简陋小木屋——大行其道,始终不衰。同时,随着强制的工业化和各种生活方式(城市交通、电影院、剧院)的集体化,普通的俄罗斯人也尝到了城市生活的甜头。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化在这里既是政治动荡的产物,又是亲斯拉夫主义者与亲西方派之间一个多世纪以来势力争夺的结果。

这种经验同样可以在公共与私人关系方面得到证明。在苏维埃制度下,国家化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只容许个人生活的不完整残片存在,而且还被严密监视甚至可能受到镇压。同样是在这里,在一个无论在立法方面抑或在心理方面都对个人创意的自由没有做好准备的社会中,开放又引发了某些缺乏规则的非理性过程。所以,至少是在建立房产自由市场的初期,将住宅让予居住者和转售是在一种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在同一幢楼里,既有深谋远虑的业主,又有投机的投资者,以及多疑的租赁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授予一份未得到很好修缮并即将被征税的房地产的名义权利。总而言之,对于公共部门的管理不存丝毫幻想,放弃管理比之以前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是从奥斯曼时代以来“横向产权”的关键问题之一(参见共有产权法规)。

城市的交通运输本身也因这种突然的过渡而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在莫斯科,地铁、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组成了一个相当有效的网络,只有在郊区的市政建设混乱情况是例外:在为永远不会到来的疏散的中央机关(各个部、商业中心)保留征用土地的借口下,把居住区建在离地铁站几公里远的地方。今天,家家户户加速摩托化,将城市社会抛上某些更加令人生畏的道路:某些不适应的基础设施中的管线流通阻塞,中心干道上车辆的乱停乱放,侵入“罐头盒”式楼群墙根的野蛮泊车,严酷的气候所必需的车库。公共空间的堵塞和私有化,由于旨在掩饰苏联城市的传统短缺而增设服务和

商业设施,而进一步加剧。由此在居民中产生了一种改善生活条件只是空热闹一场的感情,其结果是城市空间的贯通性和地域组织的普遍利益的名副其实的蜕化。后共产主义社会根据自己的切身体味,正在感受到“公共”未必等同于“国家”,而“集体”未必意味着“有权威”的经验。

这种经验以毫无疑问是更加抽象的方式,同样也生动地说明着城市政策与社会-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各自遵循平行的道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城市、地区——建立一种比较平衡的空间规划。在法国,是领土整治和地区行动委员会(DATAR)的专家治国权力鼓吹工业和稍后的第三产业的分散化。在苏联,这个角色分配给“科学技术革命”来承担。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名义下,不鼓励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首的超大城市的增长,更何况在当局的眼里,这些城市始终被怀疑为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提供庇护。控制内部迁移,限制住房规划,如此等等,成为比法国式的经济规划的“热情义务”激烈得多的手段。但必须考虑到经济的种种制约:既然生产率对于莫斯科是比较重要的,由于劳动力的培养和技能提高的需要,国营企业没有太多的困难来说服国家计划(苏联的集中的计划化)当局放松对于就业和住房建设的苛重制约。在法国1973年的“危机”之后,领土整治和地区行动委员会(DATAR)考虑到投资的减少,不得不放缓其要求;像法国一样,苏联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最粗暴的,也不能完全无视文化规律和教育规律:这样的规律始终钟情于大城市。

引入创业自由,以及更为谨慎地引入流通自由,显而易见在俄罗斯加强了这些社会逻辑。但这往往使社会机制倒转了过来。以前,第二产业——“经济基础”的就业是城市化的动力,尤其是对于数以百计的新兴城市来说更是如此;用俄罗斯社会学家列昂尼德·科甘的表述来说,这些新兴城市乃是“工业的乡村”,当局把它们纵深地分散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但就像在莫斯科的案例中所见到的一样,也出现了现实主义胜过“居民分布系统”理想地图的不妥协性的违背原则情况。今天,经济危机在所有部门悄悄蔓延:全球竞争使得以往通过自给自足来保护的俄罗斯工业产品缺乏竞争力;税收每况愈下,有影响的权势人物构成或多或少独立的战争武库(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Gazprom),变得更为吝啬的国家本身不得不精简臃肿和低效的政府机构及过分庞大的军队兵员。面对这种比较重大的经济突发情况,企

业和个体看到了更多的自由,个体选定或者单单是希望有一个长驻的场所,企业则引进投资。决策地理学重新获得了其权利,而以往它曾经被贬低为简单的地图绘制,来显示制度及其达官显要们的意愿。

事实上,发掘地域的实际潜力(教育、人的培养、文化、可通达性)以取代意识形态选择的任意的人为性,具有充分机会使后共产主义城市投身于全球化及其城市必然产物——大都市化的普遍逻辑之中。超大城市——通常是国家首都——的这种优势已经在近十多年来促使莫斯科成为自由主义价值的最牢靠的拥有者,无论是对于在这个城市中觅求良好治安和社会培训的个人,抑或对于可以避免在数以百计的中等城市中冒产生深刻危机的风险而在这里得到最大利润的公司来说,皆是如此。不过,这一法则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对于巴黎和纽约,抑或对于伦敦和东京都能适用,却对于苏联过去的70年历史并不健忘:住房的遗产、心态的重荷、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凡此种种对于如何解释地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依然是长期的沉重包袱。无论是在这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全球化并不以划一的节律前进。

*Galia et Guy BURGEL : LA VILLE POSTCOMMUNISTE :
UNLABORATOIRE DE GÉOGRAPHIE SOCIALE INCOMPARABLE
(DIOGÈNE, No. 194, 2001)*

西亚、波兰白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1999;《种族性、民族运动与社会实践》(与 N. 斯克沃尔佐夫和 K. A. 哈比布林合作,俄语),1995;《欧洲集体认同性的新基准》(与 G. 加蒂和 A. 佩雷斯 - 阿戈特合作),1999;《经受现代性考验的国家的认同性》(与 L. 凯雷和 F. 莫林合作),1986。当代东欧中心负责人。电子邮箱:carlan@univ-paris1.fr。

菲利普·海林格(Philippe HAERINGER) 巴黎发展研究所(IRD, Paris)主任研究员。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高等实践研究院),非洲学家,他对西非和中非城市社会的出现进行考察,然后专门研究世界大都市化的进程。他提出既要进行极其本土化的说明,又要进行统括经济方面的理论解释(见《转化的经济》)。现在执教于巴黎第 10 大学(楠泰尔)并主持一个名为“城市多样性”的讲座。

加里亚·比热尔(Galia BURGEL) 巴黎第 10 大学(楠泰尔)城市地理学实验室研究员。

居伊·比热尔(Guy BURGEL) 巴黎第 10 大学(楠泰尔)教授,主持该校的城市地理学实验室,专门从事城市的比较研究。近著有:《今日城市》,1993,第 3 版,2001;《巴黎——法国的未来吗?》,1999;《从一个第三世界到多个第三世界》,2000;《20 世纪雅典的奇迹》,2001。参与将《2001 年城市法国史》改编再版为袖珍丛书。

加里亚·比热尔和居伊·比热尔是《平行的城市》文库(城市地理学实验室——巴黎第 10 大学(楠泰尔))的主编,其中特别是在 1999 年出版了《改革前的苏联城市》一书。

列昂尼德·科甘(Leonide KOGAN) 生于莫斯科;城市学家和社会学家,建筑学博士。俄罗斯城市规划协会会长,俄罗斯建筑和建设科学院理事。1995~1997 年,巴黎第 10 大学客座教授,讲授特设的《俄罗斯城市化过程的特点》课程。多个国际研讨会和讲座的组织者和学术主持人,其中有:“城市环境形成中各种角色的互动作用——巴黎和莫斯科的例子”,1997 年